

對「雙重曲解」的回覆——答施用勤先生

◎ 杜應國

在網上讀到施用勤先生《雙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評杜應國〈關於托洛茨基及其評價問題〉》一文¹，不免有些愕然。施文以所謂「雙重曲解」立論，指責拙文在斯大林時代對托洛茨基「第一次歪曲」的基礎上，又對托氏進行了「第二次歪曲」。但通觀全文，卻見不到一句引自拙文的原話，相反，作者隨心所欲地轉述和莫名其妙的臆斷倒是不少。正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只是這樣一來，作者的縱情馳騁，快意恩仇，痛快倒是痛快，唯其鋒鏑所指，依據的大多是他通過有意無意的誤讀而得出來的「假言判斷」——甚而至於把一些並非筆者原話或原意的東西加諸在筆者頭上，然後再來煞有其事地批評一通，這不也是一種「曲解」嗎？作者大概忘了，正是他的這種主觀隨意，無形中已將他的批評置於一個尷尬的悖論：以曲解的方式來批評別人曲解。老實講，對這樣的批評，我起先並不打算作任何回應。我想，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只要讀者肯將兩篇文字放到一起完整地讀一遍，當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是以也就遲遲沒有動筆答覆。但後來又想，拙文發表於2005年三月，施文在《二十一世紀》網路版正式刊出是同年十二月，中間隔了九個月的時間，能夠讀到施文的讀者未必也都讀過拙文，倘有人不明究裏，只聽到一面之辭，豈不是連個澄清說明的機會都放棄了嗎？於是，這才認真地考慮寫這篇回應文字。

不過，在答復施文的批評之前，有一點需加說明的是，除了「曲解」之外，施文中所表述的觀點，還有些涉及到的是雙方對俄共革命史、黨內鬥爭史等一些重大問題在理解、認識上的偏差，牽涉的是一些更根本的思想認識分歧，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所以本文不擬在這些問題上多作糾纏，而只打算在與「曲解」問題相關度較高的一些史實上略作分說，以證在施文的理解視角之外，還有另外的視角。僅此而已。

下面是我的答覆。

一 關於「曲解」的例證

例證之一，關於「和平建設」的含義。

施文寫道：

作者認為，托洛茨基雖然最早提出新經濟政策，但他沒有意識到和平建設已經來臨，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的只有列寧。……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在喀琅施塔得紅色海軍基地暴動的壓力下制定的，而且他從新經濟政策伊始就提出誰戰勝誰的問題，即資本主義因素戰勝社會主義因素，還是社會主義因素戰勝資本主義因素的問題。看來，在列寧的詮釋下，新經濟政策下的經濟建設根本不是甚麼和平建設，而是充滿了鬥爭的建設。²

拙文涉及到此一問題的文字如下：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很多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卻一直未能認識到，新經濟政策實則是從戰時體制轉向和平常規體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戰略轉移。

細觀托氏在爭論中（指工會問題爭論——筆者）的主張，他與列寧的分歧，實質上是一個要不要將戰時原則繼續運用於和平時期的問題。

正是在工會問題的爭論中（此時正好結束的克裏木戰役成了國內戰爭基本結束的標誌），列寧敏銳地抓住和平時代已經到來這個主題，開始從時代轉折的高度來考慮如何突破戰時共產主義的局限，以實現工作重點也是戰略中心的根本轉移。³

兩相比照，自不難明白，筆者所說的「和平建設」，是指俄國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後所出現的一種非戰爭狀態，其本義是指與戰爭相對的和平。但在施先生筆下，不知怎麼就變成了「在列寧的詮釋下，新經濟政策下的經濟建設根本不是甚麼和平建設，而是充滿了鬥爭的建設」云云。看似漫不經意的一句話，既巧換了概念（「和平」變成了不講鬥爭，否定鬥爭的轉義詞，與和睦、寧靜、乃至平安無事相等同了），又暗指筆者曲解了列寧。這就很讓人困惑，列寧說的「誰戰勝誰」的問題，明明是指在和平建設的大框架下還存在著資、社兩種不同因素的「鬥爭」——正如作者所解釋的那樣，既如此，此「鬥爭」怎麼能夠跟彼「戰爭」（武裝集團之間的暴力衝突）相等同呢？再說，對「俄國黨內鬥爭的歷史」並不「無知」，且有著「完整把握」的施先生難道不知道，所謂從戰爭過渡到和平建設的提法並非筆者自創，而是列寧反覆談起，反覆使用的提法嗎？如：

這一年來，在我們的工作的各種關鍵問題中，最值得注意的並且在我看來是同我們的大部分錯誤相聯繫的，首先是從戰爭過渡到和平的問題。⁴

你們都會記得，在上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們的一切想法都是以過渡到和平建設為基礎的，我們估計當時對波蘭的巨大讓步會給我們和平。⁵

過去我們的全部經濟，不論是就整個來說，還是就各個部分來說，都是貫穿著戰時原則的，現在我們從戰爭問題轉到和平問題上來了，因此對實物稅的看法也就不同了。⁶

此外，作者還指責我「把他（指列寧——引者）的新經濟政策與後來布哈林、斯大林一起鼓吹和推行的經濟政策混為一談，並把它與托洛茨基的工業化、集體化政策對立起來，是對列寧和他的新經濟政策極大的曲解。」這也讓人感到奇怪，所謂「後來布哈林、斯大林一起鼓吹和推行的經濟政策」究竟是甚麼呢？新經濟政策是列寧1921年制定的，從1924年列寧去世到1928年布哈林與斯大林產生分歧，公開決裂，合共才四年；而布哈林與斯大林的結盟，是在1925年三駕馬車發生分裂，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結成所謂「新反對派」才開始的。在這短短三年的時間裏，他們共同推行的除了新經濟政策之外又還有一套甚麼不同的「經濟政策」呢？誠然，1922年，布哈林曾與斯大林等一起，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但他們的嘗試在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強烈干預下已被放棄。除此之外，還能稱之為布哈林與斯大林共同推行的「經濟政策」的東西，大約就只有1925、1926年聯共（布）中央先後通過的關於延長土地出租期限和放寬雇傭勞動限制的相關決議。順便說說，允許農民土地租佃和雇傭勞動力是列寧參與制定並於1922年5月通過的《土地勞動使用法》的規定，同年10月制定的《土地法典》又進一步放寬了土地租佃的期限和使用雇傭勞動的範圍。因此，布、斯二人即使在1925、1926年共同主張奉行在這方面更寬一些的政策，它與新經濟政策的本質也是一致的，

看不出是一套不同於新經濟政策的另樣的「經濟政策」。所以，施先生所說的「曲解」云云，就不知從何說起了。

最後，在緊接上述引文之後，施先生還有這樣一段話：

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模式的說法，完全是布哈林的觀點而不是列寧的觀點。雖然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要認真地、長期地推行，只要指出列寧所謂的長期僅僅是五年或十年，讀者就可以看出列寧與布哈林的區別了。從而也可以看出杜應國先生的斷言是沒有憑據的。

不知這裏說的我的「斷言」是指甚麼？從上下文關係看，似是指的「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模式的說法」，我不知道施先生是如何從拙文中找出這句話來的，只能請他再去仔細讀讀拙文，看看有沒有這樣一句「斷言」。這是其一。其二是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期限問題，這倒是我要向施先生討教的。施先生說「列寧所謂的長期僅僅是五年或十年」，不知有何憑據？老實講，我按施先生標明的出處（《列寧全集》42卷325頁）根本查不到有關「五年或十年」的記載或來源，也許他是因為筆誤而把出處標錯了吧？倒是在《列寧全集》41卷324頁上，我查到了一條與施先生的說法有些接近的話，為了不致產生歧意，茲將其引述如下：

最後，我想來談談我認為奧新斯基同志作得很正確的那幾點結論，這些結論對我們的工作作了一個總結。奧新斯基同志作了三個結論。第一個結論是「認真地和長期地」。我認為他說得完全對。「認真地和長期地」這一點確實需要牢牢記住，好好記住。由於我們有一種傳播流言的風氣，現在到處都在傳說目前的政策是一種帶引號的政策，也就是說，是在耍政治手腕，還說一切都是權宜之計。這是不對的……但是奧新斯基同志接著講到了期限問題，這一點上我倒是有保留的。所謂「認真地和長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麼悲觀。我不想預測依我看究竟要多長時間，但是我認為，他說的多少有點悲觀。我們能估計到5-10年的情況，就謝天謝地了，通常我們連5 個星期的情況也估計不准。⁷

這是我所見到的唯一一處具體涉及到新經濟政策實行期限的記載。奧新斯基認為要實行25年，列寧則表示他「不那麼悲觀」，也就是說可能不需要實行那麼長的時間，但他緊接著又表示「我不想預測依我看究竟要多長時間」，從這段話到下面緊接著說的「但是我認為，他說的多少有點悲觀」為止，列寧的完整邏輯很清楚，第一是表示25年的估計有點悲觀，他不贊成；第二是表示自己不想預測準確的時間，這看來應當不會產生任何歧義。問題出在對後面這段話的理解上，「我們能估計到5-10年的情況，就謝天謝地了，通常我們連5 個星期的情況也估計不准。」依我看，這裏說的是指對未來情況的估計不容易，「5-10年」是針對奧新斯基想預測「25年」這麼長的時間說的，意思是即使短到「5-10年」也不好估計，倘能估計「就謝天謝地了」。這顯然是舉例言之，並非單指或實指新經濟政策的期限，否則，就不會有下面這句「通常我們連5個星期的情況也估計不准」的話了。總之，是為了補充和進一步闡明他「不想預測」的具體原因。

此外，順便插一段與此相關但卻有點離題的話。這就是《列寧的國務活動》一書的作者埃·鮑·根基娜提供的另一個說法：「至於具體的期限，列寧在回答奧新斯基的時候說，他現在不想確定期限，雖然他認為以二十五年為期是樂觀了一些。」⁸

根基娜依據的是《列寧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3卷新增的材料，她沒有把5-10年作為列寧估計的具體期限而轉述出來，顯然是因為她正確理解了這個期限的含義。但這裏也有一個細微的

差別，即對奧新斯基的估計，這裏說的是「樂觀」，而中文版《列寧全集》譯的是「悲觀」。一字之差，用意卻完全相反。照前者說，列寧認為25年還不夠，照後者則相反，認為25年長了。不知是根基娜引用有誤？還是該書的中文譯校有誤？抑或是全集譯校有誤？還望能夠引起有關人士的注意，給予妥當解決為好。此外，在列寧最後完成的文章《論合作制》中，倒是有一段間接涉及期限問題的話，與根基娜轉述的期限比較接近：

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個個參加合作社，還須經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一二十年。⁹

例證之二：關於斯大林、托洛茨基兩人的鬥爭

施文寫道：

如果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鬥爭真像作者所說的那樣是性格、稟賦的不同，是權力欲和野心之爭的話，值得兜這麼大的圈子嗎？

筆者提及與此意思相關的一段話，是針對杜建國先生文中對鄭異凡先生「有些指責甚至連邏輯都不顧」這一點而發的。舉的例子就是杜建國對鄭先生關於托氏提出的工業化由斯氏實現的說法所表示的詰問：「既然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主張大同小異，那麼他們又怎麼會不共戴天呢？」拙文的原話是：「這就很讓人驚訝，『主張大同小異』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嗎？除了主張，還有性格、氣質、以及個人恩怨、權力之爭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

任何人讀了這樣的話都不難明白，這裏針對的是《托文》作者設問的邏輯，強調的是除了「主張」之外還存在其他有可能引起「不共戴天」的因素（但又不僅限於這些因素）。這是泛論，它雖包括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兩人的個案卻又不單指這兩人，尤其並不將兩人的衝突僅僅歸結於這些因素。所以，拙文特意在括弧中說明：「上文因只考慮邏輯，對此（指斯、托二人的『主張』比較）未作甄別。」並在後文明確指出：「只不過，他們兩人的關係事實上遠比這裏說的要複雜得多。」如此明白的意思，施先生居然讀不懂，實在讓人匪夷所思。如果不是出於某種有意的誤讀，那就很難解釋，施文中何以會頻頻出現那麼多類似的現象。比如——

例證之三，拙文開頭說了一句：「偶然在《視界》上讀到杜建國先生的大文《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真沒想到現在也還有人對托洛茨基有興趣，而且作的又是翻案文章，自然多了幾分注意……」就是這麼一句簡簡單單的話，不知何故竟惹得施先生大為不快，耿耿於懷，先曲解一遍，「難怪杜應國先生對杜建國先生研究托洛茨基不以為然了，他以不屑的口吻說，居然現在還有人對托洛茨基感興趣。」猶嫌不足，再譏刺一遍：「杜應國先生對今天還對托洛茨基感興趣的人居高臨下，簡直就象成年人看小孩胡鬧一樣。這大概又是作者的一個想當然。」真不知施先生是如何獨具隻眼地從中讀出了這麼豐富的內涵，又是「不屑」，又是「居高臨下」云云。但如此隨心所欲地讀解又是不是「想當然」呢？

事實上，我說那話，第一是針對國內語境而言，雖然沒有明確加上「國內」二字，但我的討論物件及其載體的發行範圍已經限定了這一點。施先生故作驚聳，告訴我在互聯網上可以見

到一個何等可觀，何等龐大的托洛茨基研究陣容。如此看來，是我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了。那就請施先生再費心告訴我，遠的且不說，只說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間，國內的托洛茨基研究狀況又如何？是不是也陣容可觀，碩果累累？第二，我的話確是有感而發，只是這「感」說來話長，也很複雜，不說也罷。僅就其中一個既特殊又明確的原因來說，誰不知道，托洛茨基問題在中國大陸一向是個敏感話題，甚至是研究禁區，其影響所及，甚至連陳獨秀研究也一度受到嚴格禁止，更不要說與之相關的中共黨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事件和思潮了。也許是我少見多怪，自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研究托氏的專著，也就僅見到已故李顯榮先生的一本《托洛茨基評傳》。尤其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與托洛茨基同時代的革命家多被視為歷史超越的過時人物而迅速遠離了公眾的視線，再難引人注目，其冷寂和冷遇更是日甚一日。這種情況，施先生不是不清楚，他明明寫到：「在『告別革命』、『人間正道私有化』的口號下，還會對托洛茨基感興趣嗎？」既如此，又何獨要對我那句「沒想到」如此的念叨不已呢？

例證之四，施文在談到托洛茨基關於「擰緊螺絲釘」、「整刷工會」以及「工會國家化」等主張時，施先生按照他的理解，從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框架出發，對托氏只能採取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政策進行了辯解，對列寧與托氏的分歧作了他认为合理的解釋，而後筆鋒一轉，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聯繫到托洛茨基是在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建議被否決之後才不得以求其次，就更沒有理由說這些措施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獨裁者的嘴臉，若是他在權力角逐中獲勝，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獨裁者。

這話很讓人莫名其妙。不錯，筆者在比較分析斯、托兩人的性格時，曾經說過「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鐵腕人物，對大權在握，發號施令有著同樣的喜好。」然後舉了托氏天性中喜歡紀律與服從的性格傾向，以及他在內戰中對行政命令主義的依賴和在工會問題爭論中表現出來的對戰時方法的偏愛，歸結道：「不難想像一旦大權在握後的托氏會是甚麼樣——儘管不會與斯大林完全一樣。」

白紙黑字，明明是一個不確定的語式判斷，怎麼在施先生筆下就變成了「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獨裁者」了呢？施先生可以不同意乃至反駁筆者的判斷，卻沒有理由隨心所欲地變換對手的話意。再說，筆者這裏強調「鐵腕人物」而不用「獨裁者」，一是因為托洛茨基從未有過獨立執政的經歷，因此不好妄加推論；二是根據托氏在內戰時期和整頓鐵路運輸工會時所表現出來的強硬作風和命令主義傾向，甚至還部分地包括他後來對反對派，乃至對第四國際及其所屬各地託派組織的有力控制等，這樣的人如果有機會獨立執政，是很有可能成為「獨裁者」的，但這畢竟只是「可能」。就托氏而言，他能否成為獨裁者，不僅取決他的性格，也取決於他的理念，還要取決於蘇維埃官僚體制對他的束縛——他能否擺脫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擺脫這個機構對他的制約？如此等等，都是些不確定因素。因此，誰也不敢說他一旦掌權就一定是「斯大林式的獨裁者」！至多可以說他也是個喜歡集權的威權主義者而已。也因此，筆者行文時並不敢把話說死，說絕，而施先生卻要來幫我說死、說絕。對此，我只能說，這又是施先生的一個「想當然」罷。

至於講到對托洛茨基「擰緊螺絲釘」、「整刷工會」和「工會國家化」、「勞動軍事化」等主張的評說，施先生責備我「沒有交待清楚其歷史背景，其結果仍是在歪曲。」那麼，我們就且來看看他是怎樣「交待」的，有沒有甚麼歪曲之處吧。

按照作者的說法，托洛茨基是在他以實物稅取代餘糧收集制的建議被否決之後，為了解決嚴重的經濟問題，「他只能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尋找出路，即『正確地、系統地實行戰時方法，以求得實際經濟成果』。而當時工會組織（從中央到地方）並不理解經濟問題的嚴重性，極大地妨礙著經濟建設的有序進行。托洛茨基採取的『擰緊螺母』、『整肅工會』、『工會國家機構化』的措施只能說是不得以而為之。」因此，他與列寧在工會問題上的分歧，僅僅是列寧從政治方面考慮問題，托洛茨基則從經濟方面考慮問題。作者並且認為：

這兩種考慮在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下，只能各執一端，顧此失彼。因而不能說列寧的考慮是正確的，托洛茨基的考慮是錯誤的，反之亦然。沒有糊口之糧、工業燃料、原料，光考慮政治不行；不考慮政治，單單考慮糧食、燃料和原料也同樣不行。

對於這段妙論，我們後面再談。先來看看作者所交待的歷史背景是否都清楚，有沒有「歪曲」之處。

首先，應該弄清楚的是，托洛茨基「整刷工會」、「擰緊螺絲釘」的主張是在甚麼背景下提出的？對此，施先生只含糊其辭地交待托氏採取這些主張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當時還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但他卻忘記了此時正是俄國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從戰爭向和平的轉折即將開始這一最最重要的「歷史背景」。托氏最早就工會問題發難，是在1920年11月3日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的俄共黨團會議上，11月9日，他向俄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名為《工會及其今後的作用》的提綱初稿，再次重申了他關於工會危機，整刷工會的主張。而此時，紅軍在克裏木向弗蘭格爾軍隊發起的最後階段的進攻已經打響了三天，並於17日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至此，克裏木戰役成為俄國國內戰爭基本結束的標誌。12月24日，俄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公開爭論工會問題，25日，托氏就提出了系統表達其主張的、具有綱領性質的小冊子《工會的作用和任務》。一時之間，爭論遍及全黨，連許多地方組織也捲進去了。黨的上層領導更是出現了公開的派別組織。儘管如此，同樣捲入爭論的列寧並沒有因此而忘掉轉折已經到來這樣的大局。在一篇批評托洛茨基錯誤的文章中，列寧清醒地寫道：「在分析目前的政治局勢時，我們可以說，我們正處在過渡時期中的過渡時期，整個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過渡時期，可是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可以說是一系列的新的過渡時期：軍隊的復員，戰爭的結束，獲得比以前長得多的和平喘息的時期的可能性，比較鞏固地從軍事戰線過渡到勞動戰線的可能性。」¹⁰

但反觀托洛茨基在爭論中發表的文字，卻看不出他對已經到來的轉折有何明確的認識，而這正是他與列寧的一個根本的區別。列寧正是看到了和平建設即將開始，所以堅決反對托氏關於強化戰時體制的那些主張，而托洛茨基正是沒有這樣的認識，所以要求繼續實行軍事化的政策。拙文正是據此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與列寧的分歧，實質上是一個要不要將戰時原則繼續運用於和平時期的問題。

其次，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背景，那就是在工會問題爭論爆發前產生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也就是施先生所說的糧食和燃料、原料的危機，但他沒有交待清楚的是，引發這一危機的原因以及其表現形式，卻是一場更嚴重的政治危機，那就是人們對餘糧收集制的普遍不滿。大約從1920年秋起，一連串的農民暴動就席捲了俄國，不斷上訪的農民代表，以及各種抗議、申訴和抱怨的信件雪片一般飛向莫斯科，有的申訴就直接寄到列寧手裏，其中一封出自坦波夫省某紅軍士兵之手的信，就直言不諱地寫道：「農民的情緒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如果在我們縣不很快根絕這類現象，那就必然爆發暴動。這將不是富農的暴動，而是對正義

的勝利喪失了任何希望的勞動居民的暴動。」¹¹所以，到1920年底，俄共中央就在13個省停止了餘糧收集制。嚴重的勢態和農民的情緒表明，此時俄國社會各階層對軍事化政策的忍受已經達到了極限。在這種背景下，是適時地緩和軍事壓力，還是繼續加強戰時體制？是該從全局性的政治著眼，還是該從從屬性的經濟著眼？今人應該是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來的。就是托洛茨基，在爭論中雖一再強調自己是從經濟問題著眼，但在後來的回憶中還是不能不承認：「然而，經過三年內戰的工人群眾卻愈來愈不願意服從軍事管制的方式。列寧出於準確無誤的政治本能，意識到已經到了危急關頭。我根據在戰時共產主義基礎上所作的純經濟角度的考慮，試圖讓工會作出空前巨大的努力；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的列寧，則採取措施減輕了軍事壓力。」並最終承認，由他引發的「這場爭論（指工會問題的爭論——引者）是離題的」。¹²對於托洛茨基的這一表態，施先生不知何故未完整引述，卻對此提出了他別出心裁的解釋，認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不同考慮是「各執一端，顧此失彼」，而且還不能說哪一方正確，哪一方錯誤！¹³我注意到，作者在表達他的這一意見之前，有意加了這樣一句限制：「這兩種考慮在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下」，而恰恰是這句話，不經意地透露了作者試圖挑釁列寧與托洛茨基在工會問題爭論中表現出來的一個根本性差別：列寧的考慮已經超越了戰時經濟政策的框架，而托洛茨基的考慮卻仍局限在戰時經濟體制之內，如此巨大的差別，怎麼能說是「各執一端，顧此失彼」，誰也說不上正確和錯誤呢？據此，施先生在文中所引的那段他認為「說得夠清楚了」的出自托洛茨基回憶錄的話，就不知道是「夠清楚」地表明瞭托氏與列寧完全一樣，也清醒地意識到和平建設已經來臨，需要適時地中止戰時共產主義呢？還是恰恰相反？施先生不妨再去仔細品味一下原文的含義。

最後，對施先生下面這段詰問似也不該完全置之不理。

如果像杜應國先生所說的那樣，列寧意識到和平建設時期已經來臨，而托洛茨基的經濟政策與列寧的背道而馳，那麼杜先生又如何解釋列寧在其『遺囑』中在經濟、政治、乃至人事安排上都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邊呢？

首先，「列寧在其『遺囑』中」是否「在經濟、政治、乃至人事安排上都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邊」，這本身就需要討論，但因這個問題說起來有點離題，這裏姑置勿論。我只想說，對此施先生可以有他與眾不同的理解，但卻不能將之當作定論，一語定音，不由分說。

其次，我不十分清楚作者這裏所謂「托洛茨基的經濟政策」是指甚麼？如果就是指前面說的「擰緊螺母」、「整肅工會」以及「工會國家化」等主張，那麼，第一，我不知道這與後來的「列寧遺囑」有何直接關係？第二「背道而馳」與否，並不由我說了算，另有兩個比我更權威的人可以說了算——這就是爭論的兩位主角托洛茨基與列寧。對托氏著作應該十分熟悉的施先生想來不會注意不到托洛茨基在其回憶錄中說過的這兩段話吧：

在後來整整一年中，國家的經濟生活便在一條死胡同裏掙扎。我與列寧的不和就是由於這條死胡同引起的。¹⁴

第十次代表大會前夕，我們的路線發生了對抗性衝突。黨內爆發了一場爭論，但事實上這場爭論是離題的。¹⁵

至於列寧，他在爭論期間寫下的《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黨內危機》、《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等文，請施先生再去讀讀，看看列寧對托洛茨基的那些批評，究竟是證明了列寧與托洛茨基的主張是「背道而馳」呢，還是相反？

二 關於兩條「知識性錯誤」

施先生指責我的文章有一些「知識性錯誤」，其中最重要的有兩處。

一是作者斷言，托洛茨基與其他政治局委員共同決定封殺列寧罷免斯大林的遺囑。

說實話，讀到這樣的「作者斷言」，真不知該說甚麼好。翻遍全文，我也找不到施先生所說的這句「作者斷言」。拙文涉及到所謂「列寧遺囑」的地方——包括兩條注釋在內，合共也僅有三處。其中最接近施先生「作者斷言」的地方，大概是正文中的這一處：

在列寧死後公布列寧「遺囑」，按理應照「遺囑」所示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時（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直接罷免斯大林的絕佳機會），托洛茨基卻再次判斷失誤，不僅未能果敢地抓住這次稍縱即逝的機會，反而有些無動於衷，錯失良機，故作寬宏地與他的對手們一起挽留斯大林，由此造成了他一生中最追悔莫及的錯誤。

這段話要說有誤，是誤在「故作寬宏地與他的對手們一起挽留斯大林」一語。此語表述的事實是有的，但它不是發生在列寧逝世之後政治局內部公開列寧遺囑之時，而是發生在列寧去世之前，即在列寧委託托洛茨基替他出面為格魯吉亞事件辯護時，托氏在與加米涅夫的談話中表明的態度：「不贊成罷免斯大林」。這一點得感謝施先生的批評，使我有機會來糾正自己的這個疏忽。但即便如此，這也與所謂「封殺」列寧遺囑無關。贊成不贊成撤換斯大林，與同不同意向全黨公開遺囑並不是一碼事。此外，拙文還有一處類似的錯誤，是說托洛茨基「推掉了在列寧逝世後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作全黨政治報告的殊榮」（因為這樣的報告通常是列寧作的）。這裏誤把列寧逝世之前發生的事（1923年4月召開的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原定與會，後因病未能出席），寫成列寧逝世之後，這是筆者疏於檢對，粗心大意所致。十分慚愧。類似的錯誤想來還有不少，尚乞識者正之。

另一個知識性的錯誤是作者武斷地說，托洛茨基贊成斯大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集體化。不知作者根據甚麼資料得出的這個結論。不知是不是根據國際學術界的共識。我記得《先知三部曲》中明確地說，托洛茨基反對消滅富農，集體化只有建立在相應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取得效果……

這裏有幾個問題。

第一，「作者」杜應國並沒有「武斷地」說過「托洛茨基贊成斯大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的農業集體化」這樣的話！拙文只是在分析杜建國先生指責鄭異凡先生關於托氏工業化、集體化的主張後來由斯大林實現了的說法時，表示贊同鄭先生的提法。因此，在相關的行文中，筆者用語相當審慎。一處在講到斯托兩人的政治主張不好簡單地放到一起論其異同時，我強調托氏有理論，斯氏沒有理論，因此，他時而反對托氏等人要求加快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進程，時而反過來轉向托氏的理論求救，「以托氏也無法贊同的激烈手段和速度，迅猛推行集體化與工業化的方針」。在另一處講到托氏政策與斯大林後來的做法相近時，也只是說「托氏雖然在名義上並不反對新經濟政策，但他沿著戰時共產主義的思維慣性所得出的結論、對策，實質上與斯大林後來的做法並無甚麼本質的不同，其邏輯指向到頭來還是將導致新經濟政策的終結。」僅此而已。

第二，對於斯大林後來推行的集體化、工業化與托氏理論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看法，但這是認識問題，卻不是所謂的「知識性錯誤」。

第三，我說鄭異凡先生所表述的觀點是國際學術界頗為流行的一種看法，雖然僅是一語帶過，未加申說，卻也並非是沒有依據，拉大旗作虎皮，有意「戴上一頂國際學術界公論的帽子」來唬人。既然施先生對這句話如此在意，那就索性引幾段壯膽吧。

波蘭原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拉科夫斯基——

普遍認為，斯大林採取的這一『新方針』以及強迫集體化的政策，只不過是在消滅了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以後接過他們的綱領而已。這就是布哈林一開始對斯大林的指責，許多前反對派人士也是這樣看的。

斯大林用唯一可能的手段來實施反對派的綱領，這是事實。¹⁶

前蘇聯學者羅伊·麥德維傑夫——

在對待農民的政策方面，正是斯大林突然完全採納了，甚至深化了托洛茨基關於『原始的社會主義積累』的觀點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關於對農村富裕階層實行非常稅收的建議。不僅如此，斯大林為實現這一政策使用了不久前還是『左派』反對派的許多著名人物。¹⁷

美國學者羅伯特·文森特·丹尼爾斯——

斯大林致力於把他的新政策與托洛茨基的綱領區別開，但就其本質來說，二者是相同的。實際上，他已迅速接近了左派的觀點，而且主張馬上採用暴力手段迅速而又普遍地實行農民集體化；在這一點上，他的觀點與反對派的觀點相比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¹⁸

第四，關於多伊徹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拙文已經援引了幾段「先知三部曲」的原話，作為該書譯校者之一的施先生不相信，那就再引一段：

斯大林在1920——1921年時支持過列寧的「自由」政策，但10年後，除了名稱之外，他把托洛茨基的意見全部端了過來。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擁護他們的人當時都不承認這一事實：斯大林——他不能承認為了接受托洛茨基的立場而放棄列寧的立場；托洛茨基——他看到自己的意見已被他的敵人以殘暴的方式付諸實踐，因而畏縮，不敢承認。對托洛茨基1920——1921年綱領中的每個要點，斯大林在30年代的工業革命中幾乎都利用了。¹⁹

未知施先生記得這句話否？

另外，講到「知識性錯誤」，我也來為施先生挑兩條。

一條是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制定。施先生寫道：「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在喀琅施塔得紅色海軍基地暴動的壓力下制定的。」

不錯，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新經濟政策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具體講是1921年3月15日由列寧在會上的報告中宣布並最終獲得批准的，而喀琅施塔得的暴動發生在2月28日，表面看來，是暴動在先，決議在後，但事實上，早在2月8日列寧擬定的《農民問題

提綱初稿》中就明確寫道：「滿足非黨農民關於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即徵收餘糧）的願望。」²⁰

這還只是就文本記載而言。事實上，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醞釀到出台的過程，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在某一天早上因為某個事件（諸如喀琅施塔得事件之類）的影響而突然產生的。這一點，在原蘇聯學者埃·鮑·根基娜的《列寧的國務活動》一書中，就有很詳細的記載。簡單地說，大約從1920年底起各地傳來的對餘糧收集制的不滿和抱怨中，有關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問題就浮出了水面，對此，列寧一直給予密切關注。他不僅仔細閱讀那些從全國各地直接寄給他的申訴，而且一次次地接見前來莫斯科「上訪」的農民代表，耐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與此同時，黨內有關糧食稅的討論也開始萌動。1920年12月下旬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期間，一些代表在俄共黨團會議上就曾提出了與糧食稅相近似的建議。²¹1921年2月2日召開的五金工人代表會議則通過了建議「用固定的實物稅取代餘糧收集制」的決議。1921年2月8日，列寧寫成《農民問題提綱初稿》後，俄共中央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開始起草用徵稅制代替餘糧收集制的決議。委員會成員有加米涅夫、奧新斯基、瞿魯巴等。決議初稿於2月18日完成。2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關於在《真理報》上公開辯論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問題，同意以個人名義發表主張糧食稅的彼·索羅金和米·羅哥夫合著的文章，兩人的身份分別是莫斯科糧食委員和莫斯科省農業局長。但遺憾的是，他們的文章在《真理報》發表後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因為此時有關工會問題的爭論正熱火朝天，吸引了全黨的注意。不過值得指出的是，2月28日，即在喀琅施塔得暴動發生當天，列寧在接見弗拉基米爾省的兩位農民時曾有明確表態：「就要用實物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嚴格確定向國家繳納糧食的百分數。正如列寧同志所說的，這個問題將在日內召開的全俄黨代表大會上予以解決。」²²這一資訊的意義在於，它表明有關新經濟政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出台的議程，是預先決定的，而不是在會議進程中因為甚麼喀琅施塔得暴動突然推出的。當然，喀琅施塔得事變強化了實行糧食稅的緊迫性，但它畢竟不是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或直接因素。

另一條「知識性錯誤」，是作者在談到托洛茨基主張「擰緊螺母」、「整肅工會」和「工會國家化」的必要性時有這樣一段行文：

當時的工會組織（從中央到地方）並不理解經濟問題的嚴重性，極大地妨礙著經濟建設的有序進行。

這顯然是對當時的工會職能、組織狀況的一種誤讀。事實上，當時的工會組織並非「不理解經濟問題的嚴重性」，而是由於它特定的「二重身分」使它扮演著不該扮演的角色，因而正在受到兩個方面的困擾，並由此表現出了一種力不從心的現象。

工會面臨的一大困擾，就是由「工會國家化」引起的。嚴格說來，「工會國家化」並不是一個甚麼新問題，而是自十月革命後就已開始的實際進程。十月革命以暴力方式，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而新建立起來的國家機構在履行國家職能方面還存在著極大的不完善和薄弱點，因此一向被視為「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的工會，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執政助手，也就理所當然地擔負起了部分國家機構的職能，如協助建立經濟管理機關並參與管理（如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就是由工會協助建立的），組織生產，實行工人監督等。所以，早在1918年列寧就說：「工會正在變成並應該變成國家的組織。」²³一年後，在全俄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還在大聲疾呼：「現在我們僅僅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已經不夠了。工會必然要國家化，工會

必然要和國家機關合併起來，建設大生產的事業必然要完全轉到工會的手裏。」並說「這在理論上我們也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就策劃好了。」「必須在這一條道路上繼續前進，必須再走很多步，然後才能說：勞動者的工會組織完全和整個國家機關合併起來了。」²⁴可見，在當時的語境下，「工會國家化」似乎是一個必然趨勢。不過，即便如此，列寧仍很審慎地警告說：「假如工會現在就想自作主張地擔負起國家政權的職能，那就只會弄得一團糟。」「應該說，我們不能一下子立刻把工會和國家政權機關合併起來。這樣做會犯錯誤。任務也不是這樣提的。」²⁵大體說來，工會一方面是國家機關，一方面是群眾組織的二重身分，就是這樣形成的。正是這種雙重身分，導致了工會在戰爭結束後面臨的尷尬：作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工會必須採取說服、教育、宣傳鼓動等非強制的方法，去作好它組織群眾，教育群眾，為國家管理輸送力量的工作，也就是扮演好它在黨和國家之間的仲介、橋樑作用。而作為國家機關，工會則需要更多地採用行政性的強制手段。這個內在的矛盾，在戰爭時期，在全國是一個大兵營，一切服從戰爭需要的軍事一體化體制下，被到處都在普遍採用的戰時紀律遮蔽了，一俟和平開始，軍事壓力放鬆，矛盾就逐漸尖銳起來。

工會面對的另一大困擾，是與跟它平行的經濟機關的許可權爭執。隨著「工會國家化」實際過程的加深，工會擔負或介入的國家經濟事務愈益增多，與此同時，國家機構的建立健全和國家職能的完善也在日益發展，於是，工會與其相平行的國家機關之間由於許可權不清，職責不明而產生的磨擦和衝突就日見突顯。各級工會與部分經濟機關的扯皮現象——要麼互相爭權，要麼互相推諉，確實嚴重地「妨礙著經濟建設的有序運行」。但其原因卻根本不是甚麼工會組織「並不理解經濟問題的嚴重性」，而實在是因為「工會國家化」進程實質上已經將工會推到了幾乎無所作為的地步所致。就此而論，托洛茨基提出「整刷工會」，應該說是有其一定的針對性的，他的要害是看不到戰時和平時的差別，仍試圖按照戰時原則來解決工會面臨的問題，實行「勞動軍事化」，加速「工會國家化」，這顯然是弄錯了方向，既不合理，也不現實。因為此時主張加強「工會國家化」，如果不與嚴格的戰時紀律相結合，不僅無法推行，而且只能引起更多的混亂和衝突。

與之相反，從列寧在爭論中發表的言論看，他既看到了戰時原則的局限，又察覺了「工會國家化」引出的問題，所以才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根本的立場轉變，從贊成「工會國家化」到反對「工會國家化」。正是在爭論中，列寧根據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的構想，重新定義了工會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明確了它的群眾組織的特點，指出工會只是站在黨和國家之間充當「齒輪」和「引帶」的仲介，是學習管理的「學校」，而不是甚麼國家的強制組織，²⁶實質上是反對「工會國家化」，要工會全面退出它並不能勝任的國家職能活動。更要指出的是，列寧的這一立場轉換，跟他發現革命後官僚主義在黨和國家機關裏的嚴重復活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就必須擔負起保護工人利益，使之不致受到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侵害的職責，²⁷而「工會國家化」卻有可能使工會完全喪失這樣的功能。此後工會的地位及作用，基本上就是按照列寧的這一構想來重新設計的，只是在斯大林時代一元化的集權體制下，工會的地位及作用被扭曲，最終成了甚麼作用也不起的擺設，成了具有官方色彩的「群眾組織」。但這是後話。

三 「雙重曲解」的背後

最後，對於施文「雙重曲解」的邏輯，我還想再表示一點意見。

施文以拙文為標靶，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這在學術上原很正常。不過，從施文那種主觀隨意而又不容置疑的言說姿態中，我總感到有一股掩隱不住的可疑氣息，它讓我不安，也讓人不快。及至讀完全文，我方始明白原因何在，這就是施先生在文末公然宣稱的：「不僅為托洛茨基翻案，還要重新闡釋社會主義，把托洛茨基立為正統。就像著名的中國託派鄭超麟堅持的一樣：馬恩列托」！「我想，這是包括杜建國在內的大部分托洛茨基研究者的目的。」

看來，問題就出在這「目的」了——「把托洛茨基立為正統」！

鄭超麟作為中國託派的最後一位老人，畢生堅持他的信念，雖九死猶未悔，自有其可敬可佩之處。但他所堅持的這一道統譜系，卻是大大可置疑的。

何謂「正統」？歐陽修《正統論》有云：「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²⁸看來，要成為「正統」，需有兩個條件，一是「居天下之正」，二是「合天下於一」——也就是定於一尊的意思。無怪乎我讀施先生大著，總覺得有股凜然不可犯的權威語勢，一種不容分說，舍我其誰的排他性傾向，原來已是隱然「正統」矣。

不過，細想想，這「正統」雖然可敬、可愛，然而，卻也可怕。

試想當年斯大林不遺餘力地發動反托洛茨基鬥爭，其所爭者何，不就是這「正統」嗎？再想想斯大林獲勝後，之所以能調動一切手段，把托洛茨基從俄國革命史上徹底抹去，並對其從思想到行為，從歷史到品德進行全面的「妖魔化」，他所憑藉的武器之一，不也就是這「正統」嗎？曾幾何時，當斯大林煞費苦心，以自命正統的方式構建起這個「馬恩列斯」的道統譜系時，它不僅成了原蘇聯民眾頂禮膜拜的教條，哄騙了無數的人們，而且越出國界，一度成為主宰國際共運數十年的信條。只是在不同的國家，人們會根據不同的需要，在斯大林之前或之後，連綴上其他人的名字而已。從某種意義上說，托洛茨基問題之所以在相關國家遲遲得不到公正、合法的解決，不就是這「正統」的作祟嗎？怎麼一轉眼之間——還等不及把斯大林換成托洛茨基的名字，這「正統」就成了施先生手中克敵制勝的法寶了呢？看來，像施先生這樣的托洛茨基研究者，雖然對斯大林及其時代的錯誤和罪孽深惡痛絕，恨滿腔，仇滿腔，但由於心中揣著個爭「正統」的情結，所以，他們對斯大林時代的本質認識又是有限的。在他們看來，斯大林的問題大約只是一種「個人（領袖）問題」（體制也是個人造成的！），因此，大多以一種「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看待斯、托之爭，認為只要在那條「正統」的道統譜系上換上托洛茨基的名字——歷史選擇了托洛茨基，這人世間立時就會光芒普照，滿地燦然。事實上，這樣的思維邏輯，思想理念，正是第四國際體系諸君多年來所一直在堅持、在追求的。只是他們大約忘了，這種期求於大一統，定於一的思維模式，不正是斯大林主義最基本的特徵嗎？所不同者，是斯氏要求統一到他的麾下，而施先生們則只奉托洛茨基為準繩，但就其思維邏輯而言，兩者的實質都一樣，即都是一元化的思維模式。這種一元化的意識或理念，若與權力結合，其政治表現就是專制、極權；而其思想表現，就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唯我獨尊，唯我獨革的獨斷論意識形態。是堅持還是反對這種獨斷論意識形態，這一點，恐怕才是我跟施先生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其實，就托洛茨基的研究而言，因為政治迫害所導致的那些誣辱和指控，詆毀與貶斥，早已隨著蘇聯的解體而自動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效力，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今天的托洛茨基研究者們必須首先堅持的一個前提。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還有另一面，即托洛茨基作為俄共黨和國際共運史上一個極重要的人物，他所代表的思潮和流派是世界社會主義思想運動史上的重要一翼，是多元中的一元，因而理所當然地應是思想史和學術界研究的物件。既

是研究物件，就難免會有不同意見，從歸根結底的意義講，有關托洛茨基的評價以及恢復其本來面目的問題，只有在學術界的自由研究，自由爭論中去進行。但是，從施用勤先生設置的「雙重曲解」的邏輯裏，我發現，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因為，你只要不沿著他給定的路徑走，你就很難擺脫「雙重曲解」的厄運。你若要返回當年的語境，實事求是地指出托洛茨基存在的某些缺陷或不足，你就是在堅持斯大林的歪曲，也就是「第一次歪曲」；你若要根據當今時代的發展和歷史運動狀況，指出托氏思想的局限，那就是「第二次歪曲」，是「雙重曲解」！可見，在施先生「雙重曲解」的邏輯背後，隱藏著的實際是一個雙重圍堵的邏輯陷阱，在它的兩頭封堵下，你其實只有一條出路，一個選擇，那就是全盤肯定托洛茨基，同意將他「立為正統」！這才是施先生「雙重曲解」邏輯背後的真正指向，真正「目的」。

好在，這樣的「正統」還沒有立成；更好在，懷抱這一理想的只是極少數而且還只是他們心中的一廂情願。所以非正統乃至反正統者如我輩之流，還能發表一點不同意見，並且還將頑固地堅持其反「正統」的立場，不僅不同意把托洛茨基「立為正統」，而且反對把任何人立為正統！對此，倒用得著施先生說過的話：人各有志，施先生大可不必奇怪。

在自由思想的王國裏，任何想重塑金身，在人類思想的奧林匹斯山頂上再造一個萬王之王、眾神之神的努力，都註定將是徒勞無益的。這一點，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2006年3月31日—4月4日初稿

4月7—12日修改

註釋

- 1 見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5年十二月號。
- 2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5年十二月號。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另注出處。
- 3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5年三月號。以下凡引拙文，不再另注出處。
- 4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2卷159頁。
- 5 同上，160頁。
- 6 同上，176頁。
- 7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41卷323-324頁。
- 8 埃·鮑·根基娜《列寧的國務活動》，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170頁。
- 9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3卷425頁。
- 10 同上，32卷15頁。
- 11 埃·鮑·根基娜《列寧的國務活動》，50頁。
- 12 托洛茨基《我的回憶》，華東師大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513-514頁。
- 13 托洛茨基與列寧的爭論，不管發生在哪個時代，都屬於正常的思想認識之爭。這種爭論，或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卻無有罪、無罪之別。這是今人在反思過去的思想路線鬥爭時應予重新確立的一個原則。
- 14 同上，512頁。
- 15 同上，514頁。
- 16 《布哈林思想研究譯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40、141頁。

- 17 《讓歷史來審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冊123頁。
- 18 《革命的良心——蘇聯黨內反對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503頁。
- 19 多伊徹《武裝的先知》，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563頁。
- 20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2卷123頁。
- 21 參閱根基娜《列寧的國務活動》，70-71頁。
- 22 同上，110頁。
- 23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27卷197頁。
- 24 同上，28卷402、404頁。
- 25 同上，402、403頁。
- 26 「工會卻不是國家的組織，不是實行強制的組織，它是一個教育的組織，是吸引和訓練的組織，它是一個學校，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見《列寧全集》32卷第2頁。
- 27 這就是列寧所說的工會的兩種保護職能：「全體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應當保護自己，而我們則應當利用這些工人組織來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它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同上，第7頁。
- 28 《歐陽修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118頁。